

中南海服务人员眼中的

共和国政要

朱德为彭德怀伤感

江青在大会堂「调动三军」

「九大」生了九个孩子

林彪颠摩托治怪病

周恩来用眼神指挥服务员

朱德与董必武比长寿

周恩来的玉米面糊糊

邓小平的炊事员不干了

中央全会上一个首长哭了

四个秀才一台戏



7 权延赤文集
QUAN YAN CHI WEN JI

中南海服务人员眼中的

共和国政要

权延赤 著

I25
29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uan yan chi wen ji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印刷:北京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7.5
字数:1400千
印数:2000套

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204-04127-5/I·756
定价:100元 (全十册)

目录

CONTENTS

邓小平的炊事员不干了 5

■1976年的“四五”之后,相当多的人都以为邓小平“像启明星一样坠落了”。人们在猜测他被抓被关?是死是活?

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默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

政治局戒烟失败 11

■“少奇同志的前门烟不多了,利用他讲话的机会,你上水服务,设法把咱们的中华烟弄点装到他的前门烟盒里。”这项服务是很带刺激性和乐趣性的,像小时候偷杏吃一样撩拨人心。李维信马上实践。他是怀了一颗雀跃的心“摸上去作案”……

中央全会上一个首长哭了 15

■这次的会议气氛不一般……

有关领导向服务人员宣布命令:“会议中间不许上水。”

胡志明的警卫腰围暴长 17

■其实,中国方面给胡志明准备的饭菜是充足而丰盛的,但胡志明不要。上条鱼,他必要拿刀切掉一半,另一半叫中国同志拿回去大家分着吃。他的口头语是“不要浪费”。

毛泽东“站”在水中“谈判” 20

■“什么商量?我们还有没有自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海防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把手大幅度一划,“你们都拿去算了!”

许世友喝酒选将 24

■周总理打来电话:“世友同志,听说你的家被抄了,严重吗?”

“总理呀,我的酒全被他们偷走了,一瓶也没给我留下。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哈哈,”周恩来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周恩来用眼神指挥服务员 28

■周恩来自己也盛了饭夹了咸菜,一边招呼着农民:“吃,一起吃。”……

“够吃,够了,饭带的多着呢,不够了回去就能取来。”农民们高兴地说着。

林彪颠摩托治怪病 35

■主席到哪儿都离不开水;有海住海边,有江住江边,有池塘住池塘边。没海没江没有塘,那就住游泳池。林彪整个唱反调,给他安排个好去处,他不睡觉,指着西边说有水。工作人员往西跑出一百米,果然发现一个池塘,只好连夜搬家。

“九大”生了九孩子 40

■外界不知道召开“九大”,保密措施当然不止一个挂窗帘。比如代表们一律坐大轿子车,不准坐小车也是措施之一。京西宾馆和前门饭店的大轿子车三分钟一趟,两分钟一辆,都是单个行驶,不准形成车队惹人眼目。

周恩来的玉米面糊糊 45

■周恩来是真正的美食家。他可以详细地向外宾介绍几十种中国的名菜,请客时经常亲自排出搭配得当的菜谱,同时他也可以有滋有味地嚼高粱米饭,啃窝头,喝小米粥和玉米面糊糊。

江青在大会堂“调动三军” 48

■也确实太过分了,前门后门调动三个来回,走六趟路,才“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

当司令员和政委们前门后门团团转时,一个女服务员爱开玩笑,小声对李维信说:“情报不准,调动三军;前门后门,谎报军情;团团乱转,不见尊容。”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52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五十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介绍。

“我听说过你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没讲完已经先笑起来。

用真诚战胜了“策略”的刘少奇 ... 57

■赫鲁晓夫被噎住了。怔了片刻,恼羞成怒:“当年我们不愿为首,你们非要我们为首不可。我们为首了,你们又朝我们痰盂里啐唾沫!”

“为首不是做老子党,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一律平等。”刘少奇的平静同赫鲁晓夫的躁动形成鲜明对照。

“文革”后的王光美 63

■在刘少奇的追悼大会上,在一片哀乐和悲痛的哭声里,邓小平臂缠黑纱,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说:“是喜事,是胜利!”

朱德与董必武比长寿 70

■有人义愤填膺地报告朱德,井冈山朱毛会师被画成了毛林会师。朱德听完只淡淡说一句:“娃娃年轻。”

朱德为彭德怀伤感 75

■工作人员报告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了。”

朱德看看工作人员,毫无惊讶之色,好像早知道会是这样。他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便撑着拐杖立起身,出门散步去了。

四个秀才一台戏 84







邓小平的炊事员不干了

风暴过去，满天星辰都像沾了霜花一般，闪着朦胧而寒冷的光辉，亦惊亦忧地俯瞰大地。

天安门广场静悄悄；如潮的人群，如山的花圈梦一样消失了，只剩人民英雄纪念碑独个儿神情郁郁，四周围人迹寥寥。

地面湿漉漉，据说是水洗过。据说广场本是洒了鲜血，据说花圈丛中本是挂了许多小瓶子，瓶里的液体血一般鲜红。这些小瓶随同悼念总理的花圈被一道清除了。

这是1976年的“四五”之后，相当多的人都以为邓小平“像启明星一样坠落了”。人们在猜测他被抓被关？是死是活？

“四五”前后，邓小平的情况始终还是个谜。和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言比较起来，原中南海服务处处长、现中直机关老干部局副局长李维信对我的讲述就未免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不过，唯其平淡，才觉真实，才使我有了后来的回味无穷……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职。组织上派我去他那里工作。他当时住在宽街的一所古老的宅院里，那房子现在为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所居。

上面派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由一名副指导员带领。说实在的，“文化大革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事沉浮如此剧烈频繁，我早已见惯不怪，可是邓小平的炊事员居然还没

悟过这个理儿，居然甩手不干了。

我到了宽街，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炊事员。

“报纸上到处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好再干下去？”炊事员皱起眉头望我。

“你管那么多干啥？”我说，“这是组织交待的工作。”

“组织上让我划清界线。”

“这种事你又不是没经历过，还要我怎么说……”我嚙嚙牙花，不好直说就绕着说，“你在这里干不是划不清，不在这里干也不等于划清了。”

“不干了这不就是个态度？”

“不干了，说你是故作姿态，想蒙混过关，你还是划不清。干下去，说你组织观念强，没人找你麻烦也说不定。你信不信？”

炊事员直摇头，不相信。他走了，邓小平这里没了炊事员。幸亏还有他年迈而坚强的继母，这个家才炊烟不断，保持了家庭生活所特有的那种温馨。

邓小平家中的两名服务员也不干了，据说还是亲戚，也说要划清界线。我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说明这是组织决定，如果她们走，就还得换人来。影响面扩大了不好，组织要求她们留下来继续做好服务工作。她们还听劝，终于留下来。

两个月后,炊事员回来接着干了。经过十年的反反复复,人都生了头脑,总要长见识,大概他也从周围人那里体会到“今非昔比”,看出了人心所向,不似“文化革命”初起时的情景。他回来干得还好。

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突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微妙的情绪波动,邓小平都泰然处之。他每天寡言少语,在庭院里一圈圈地散步,有时也割草。他干得非常仔细,像是做一件细致的工艺活儿;将草一根根割下来,摆放整齐,在太阳下晾晒……

在宽街这座年岁已久的迟暮的宅院里,邓小平又开始散步了。“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被打倒,“流放”江西时,便是围绕小小的院子这样散步——

“每天的生活很单调,但也有规律。早晨,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一起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老祖母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有人看守监视着绝对不许外人进入他们的宅院。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天长日久,他的脚步踩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他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深思熟虑着……”

邓小平由于个子小,喜欢说句玩笑话:“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思想信念,保留或坚持什么样的个人观点,但历史已经不可改变地证明,他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巨人。当他那四川人所特有的宽直的双肩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思考和责任感,“一圈一圈”地,“脚步踩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时,他的女儿邓榕有过这样的描写:

“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

达观。”

只有将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并且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的人,才可能具备这种“达观”。

现在,邓小平依然是一圈又一圈地散步。他若坐下来,会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所以,比较而言,身边无论亲人还是工作人员,宁愿看到他一圈又一圈无休止地走下去。

李维信悄悄地坐在荫凉里看小人书。那是卓琳抱来送给他看的,有成套的《三国演义》,也有散本的连环画。

“怪寂寞的,你看看书吧。”卓琳就说了这么一句。

李维信却十分感激。他等于是“陪绑”,深居简出这座迟暮的宅院,日子确实不好打发。那从远涉大洋留学法国到烽火揭竿、领导百色起义,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一生纵横天下、叱咤风云的邓小平,一旦局限到这迟暮的小宅院里,又将是什么感觉?

这一年,邓小平已是七十二岁,但是没有人尊称他“邓老”,所有人熟悉的最尊重的称呼仍是“小平同志”。这不仅是历史形成的,更由于他的身体、性格和精神状态无法叫你称他“老”。

人老不老,不能简单以多大岁数为标准。活一百岁的人,七十岁仍在盛年;活五十岁的人,四十岁已届暮年。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仍然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吸烟香,身体强。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仍然坚持冷水浴——不怕冷,骨髓盈。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仍然酷爱游泳,嗜好桥牌。他说:“我能游泳,尤其是在大海里,这说明我身体健康;我能玩桥牌,说明我还头脑清醒。”何况,他对于桥牌,不是一般的玩角儿,堪称是世界级。他身居高位,仍追求普通人的生活,并且童心不泯。打桥牌输家必须在桌子下爬一趟,他虽生性好强,实力很强,但偶尔输了,也决不例外,坚持要爬。“这是玩

牌的规矩嘛!”这种“玩牌的规矩”在政治生活中也有类似反映。他一旦在政治斗争中遇挫,被局限于古老的小宅院时,也能泰然处之,不会气急伤身。“这是政治斗争的规矩嘛!”他可以等待时机实行自己的主张,这也是“绵里藏针”。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没有“头上花菱”、“顶中光灭”、“本座失乐”、“两目频瞬”、“衣衫弛漫”一类的“天人五衰”的任何征象;他身体不臃肿,眼皮不耷拉,肌肤不干滞,脚步不蹒跚,更不会仰靠坐椅,张嘴向天……

当李维信第一次走进这所迟暮的宅院,同邓小平握手时,他感到那股劲头那股力量顺着他的胳膊和肩膀,直摇颤了他的半个身子!

李维信说起小平的散步,可以深入细致,滔滔不绝。观察日久,感受自然深。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在十八所工作时,邓小平喜欢那里花木繁茂,绿荫浓郁,便常常对他关照一声:“花开得好时,告诉我一声来散步。”

李维信多次陪邓小平散步,更多次地观察邓小平散步:

——他不会踱慢步,习惯急速走;步子越快,眼睛越亮,情绪越高涨。

——他跨入庭院时,目光环顾着一扫;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里藏着犀利。

——初散步,或者说走前三圈,那脚步说不上急速,也决不是拖沓,而是匀速向前。他的两眼目光微敛,仿佛要独自静心,寻找体味什么;渐渐地,朦胧的两眼漾出一种静谧无言的遐想,或者是深邃隽冷的思考。

——一旦捕住了什么,他的脚步便开始加快;像是要追逐到那电石火花一样闪过的念头,像是怕那线索中断,目标稍纵即逝……他加速再加速。

——毛毛曾回忆说:“看那种又快又踏实、急速的步子,我心里想,他的信念、想法和决心也许变得更明确、更坚定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我有同感。当那步子陡然一缓,邓小平的头便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所熟悉的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里藏着犀利……

——于是,我也松了一口气。我明白,他的一些想法已经悄悄酝酿成熟,有朝一日会冒出头来,并且一飞冲天……

据说,巨星殒落,总伴有异兆。

这一年,有雷自唐山方向来,地大震;山岳摆簸,暴雨如注,楼倾城陷……

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颗巨星先后殒落。

邓小平仍然在宽街这座迟暮的宅院里一圈又一圈地急步而行。只是脚步深重了许多。因为他的心境沉重了,忧虑和责任感都变得越来越沉重。

他也遇到一点小麻烦,就是前列腺炎。当他散步时,李维信有时就须到301医院拿药,联络专家医师来诊治。

地震后,邓小平由于前列腺炎,发生排尿困难。李维信给301医院打电话,医院派人来给插了管子。由于不慎感染,打针效果不明显,医生说:“很危险,非住院不可。”

李维信立刻向有关方面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接着,又给301医院院长挂电话,请医院做好准备。他说:“红旗车一来我们就出发。”

傍晚,汪东兴的秘书终于回来电话:“同意住院治疗。”

红旗车又开进了宽街这座迟暮的宅院;房屋依旧,却生出一种久违的感觉。

邓小平住进301医院六楼,整个楼道只住了他一个人。是重视还是保密?过去李维信来医院联系医师及取药,都不讲邓小平三个字,只讲代号。其实医师和司药心里全明白,听见代号就知道为谁看病,为谁取药。现在住院,虽然报纸和广播每天口诛笔伐,但叶剑英做了明确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两个“一定”,说明了什么?至少叶剑英也



是有预感,有想法,甚至是有了具体打算和准备……

邓小平的手术很成功,党和国家的手术也很成功——“四人帮”这个瘤子被割除了。

术后的邓小平身体恢复很快,当他一支接一支吸起烟时,不但表明了“吸烟香,身体强”,而且显示着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能够使党和国家也迅速恢复健康,发展壮大。

他什么文件也看不到,不了解情况是不好下决心采取行动的。他将目光投向李维信,那目光比语言还传神。

李维信每周来 301 医院两次,探望邓小平,看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他从 1951 年进中南海,就一直为中央首长做服务工作,善于从一瞥目光、一个微笑或是一声轻咳里察知首长的想法和意图。当他的眼睛和邓小平的目光相遇时,立刻走到这位老革命家面前。

“首长有什么事吩咐?”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相依为命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

“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下来了吧?”

“下来了材料之一,后面还要下。”

“传达到哪一级?”

“全体党员都传达到了。”

“你帮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我要求看一看。”

“行,我马上汇报。”

邓小平的要求合情合理。他虽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他仍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能拒绝他的这一要求。

很快,李维信将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交到了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接过材料时,手里仍然夹着烟。他不忙不迫地将材料举在面前望一眼,然后朝李维信点一点头。

李维信退到一边,邓小平开始看文件。他看得认真,可以说聚精会神,有时嘴唇还轻轻

蠕动,那是无声地阅读。他的目光犀利,缓缓扫过字里行间;当他的目光自上渐渐扫到下时,有时又跳到上面,将看过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翻页。

他终于读完了材料,放到一边,续燃一支香烟,重新将目光投向李维信:“坐这里,坐过来。”

李维信坐到邓小平身边。

“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邓小平深深吸一口香烟,略有屏息,痛快地将烟喷出。长长的烟柱直撞到茶几上才翻卷着朝四周弥漫开。他微微一笑:“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没错,‘四人帮’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早恨透他们了。”李维信说着,朝门口瞟一眼,忙起身让开一边。专家和医生们来查房,为邓小平研究病情和治疗情况。他们脸上带了轻松的笑容。粉碎“四人帮”后,



他们和人民大众一样都舒了一口气。

“小李,不要走。”邓小平招呼站到门口的李维信,“你也进来听听。”

李维信回到病房,听专家介绍病情和治疗结果。愉快轻松的笑声贯穿了检查和研究的全过程。

送走医生,邓小平两眼闪闪发亮,情绪很高。他将医生劝说少吸烟的话搁置一边,又点燃一支香烟,兴致勃勃地问李维信:“再谈谈,外面有什么新闻?”

李维信眉毛一展,嘿嘿地笑出声,他生得肌厚肉重,开心时,圆胖胖的脸上便泛出红光来,带着鼻音嗡嗡声喻气说:“还真有一条地道的爆炸性新闻呢。”

“怎么就是地道的,那还有不地道的了?”邓小平的一双大眼闪烁出孩子一样天真好奇的波光。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或形容。”李维信做着手势说了那条“爆炸性新闻”。那是邓小平的女婿,骑了一辆国产摩托车。出门时,气缸爆炸了。金属碎片炸飞出去,炸到了哨兵。

“伤人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没伤。”李维信摇头,“气缸片炸到哨兵的大衣上,没多大劲。”

邓小平松口气,随即发出感慨:“咱们好多事情就是质量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还一个劲自己瞎吹。那个‘风雷’号远洋轮,我说质量不行,江青就跟我吹,又跟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类,就是不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生产力,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那才是反马克思主义呢。”

李维信本是随声附和,下意识地点着头,听到后面几句,眼睛顿时一亮:可不是吗?“文化革命”十年,整天喊解放全人类,自以为最革命,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若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那还谈得上什么革命和解放?

“是这个理。”李维信朴素地说,“我们老区不少地方到现在还吃不饱穿不暖。自己都

没过好,还说别人应该像我们一样获得解放,人家信吗?”

邓小平为这句实在话笑了,转个话题说:“我的电视机坏了,你帮忙找人修修。”

“没问题,”李维信接受任务一般,“我找人修。”

他将电视机抱到广播电视部技术机要处,找了一位管扩音的熟人,说:“帮个忙,把这部电视机修修。”

“先放下吧。”

李维信把嘴贴过去,小声地:“这是邓小平的。”

“嗯?小平的!”这位熟人略一怔,马上来了热情。“邓快出来了,这是人心所向。我马上修。”

不久,解放了一批老电影。李维信拿来十几部解放的影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并未对这十几部电影获得解放而满意。他说:“不止十几部好电影吧?过去许多片子都是好电影,都可以拿出来演么。”

稍停片刻,邓小平带着回忆的神情,一字一板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牺牲了多少烈士,我们活着的是幸存者。老电影要解放出来,老同志更要解放出来……”

夜深了。

李维信睡不着,搬把椅子坐到院子里。

今夜星光灿烂,仿佛有人将光明的种籽播撒遍了整个蓝黑色的天空。他心里潮起潮落,零星往事,无论大小巨细,都如星斗一样在记忆中浮现出来,明光闪烁,星斗浮出越多,点点滴滴的光芒渐渐交织融和,使整个心境变得明亮清澈起来……

他是山东临沂人,吃地瓜煎饼长大。那东西是在火上干煎出来,又硬又韧,卷了大葱在嘴里充分咀嚼才能咽下。大约是咀嚼充分的缘故,临沂人都是方面阔腮;大约是唾液充分酶化了食物,营养不多却吸收充分,临沂人都有副粗壮敦实的身架骨。打日本人,打国民党,英雄好汉出来不少。

抗美援朝,李维信离村参军。出国前,带



队排长忽然来了，捶捶他那沂蒙山一样宽厚的胸脯：“小李啊，组织上要挑一批身体好的穷苦人去北京保卫毛主席。”

“美国鬼子要打北京？”李维信急得瞪圆了眼。

“他打不到，可是能派特务来呀。”排长的神色好像大批美国特务已经近在眼前。“毛主席说，要山东人保卫党中央。山东人做保卫工作好，忠诚直爽。”

就这样，李维信没有去朝鲜，进了北京城，分配在警卫师二团。二团的兵百分之九十是山东人。

一星期后，李维信又被选送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因为他身体好，能吃二斤包子；因为他有文化，在儿童团学过字。进干部学校简直像“一步登天”，因为学员穿全系扣式的干部军装，而战士穿的是类似苏式战士服的只有半截衣扣的军装。半截扣“都羡慕那些全系扣”。

公安干部学校里学的是住地警卫、火车警卫、会场警卫、宴会警卫、武装警卫……

其中还有一项服务招待。

绝大多数人以为干公安的只有警卫是正经活儿，服务招待与公安不沾边。谁想到呢，毕业考试偏偏有一大道题是关于服务招待。

考完试回来议论，这道题就李维信一人答好了。

为此，他毕业被分配入中南海，住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经常散步经过的“静谷”，成为管理科的一名招待员。招待员在干部队伍中职务不能再低了，铺的是草垫子和五幅布的床单，盖的是一条薄军被，七个人睡一个



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屋，夜里冻得睡不着，便俩俩结合，合睡一个被窝。剩一个单数找不到伴，就将别人的衣服裤子全压到被子上……

可是招待员的地位又高得令人羡慕。整天和中央领导在一起，不敢说完全平等吧，至少可以经常聊聊家常。跟那些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说话有时比那些省委书记还随便得多。

这种生活使李维信感到很光荣，也很留恋。当他仰面满天星斗时，群星能慢慢化作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不但有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有世界其他国家或人民的领袖。这些面孔有喜有怒也有悲，却永远地缀在天空明光闪烁。在那交融的清辉里，他仿佛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坐在了颐年堂，热烈地讨论着天下大事；仿佛看到金日成、胡志明、赫鲁晓夫、西哈努克、尼克松……先后以不同的风采走进中南海，走到宴会桌旁。

酒杯举起来了。餐桌旁，大厅里，杯子在灯光下闪烁，又是一种昨夜的星辰……



政治局戒烟失败

年轻、新奇,时间就像凝固了,一天的事情有一年那么长,那么多;年老、麻木,时间就像长了翅膀,一年的日子过得比一天还要快,眨眨眼已经飞过去,脑子里什么也没留下……

李维信觉得忙了有一天了,可是抬头看一眼挂钟,才过去十分钟。

他也没干什么活儿,只是看老同志操作,听老同志讲;眼睛忙,脑子忙。

桌子上摆满瓷杯,一个个用开水烫过。老同志一边烫一边讲:“烫过就晾在那里,不要拿毛巾擦,毛巾上细菌很多,不卫生。”

李维信觉得新鲜神秘,他头次听说细菌,而且毛巾上很多;在家乡洗过碗都习惯拿块抹布擦,擦得亮晃晃。这里不擦,而且杯子上写有号码,共产党的五大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都编了号,自己用自己的杯子,不像家里,随便抓。

老同志往杯子里放茶叶,说:“这是龙井茶,毛主席、高岗、彭德怀,这三位首长的茶叶要多放些。”

李维信恨不能把杯里的茶叶看入眼中,以免将来独立工作时放多放少不合适。

“陈云同志的少放,几片就行,要个色儿。林总是不喝茶的,上白水……”

编号只编到政治局委员,其他首长不入“号”,杯子可以混用。

放好茶叶,抓起暖瓶泡茶。每个杯子里只倒一点水,老同志手中的暖瓶稍倾即止,手臂一抖一收,动作又快又潇洒,节奏分明:“水不要倒多,泡个底,首长到了才能正式冲茶;冲一杯,上一个,趁热上……”放下暖瓶时,特别叮咛一番:“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论通知不通知开会,要常备开水,四小时一换,保证水温足够高。”

李维信睁大眼睛频频点头,脑子已经塞得很满了。单是五大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编号就够他脑子转个没完。

老同志已经朝会议桌上摆烟。嘴里一边介绍:“首长自己都带烟,不抽招待烟,可也有忘了带的时候。主席喜欢抽劲大的,三五牌;少奇喜欢抽中华,不过他平时抽前门,自己也总是带前门烟,中华烟太贵,总抽抽不起。烟摆这里他不会动,他抽自己的前门,可是也要摆。会议要是超过半天,他那包前门抽光了,就得抽中华了,会议常有开一整天散不了的时候……”

李维信仔细辨认记住不同的牌号的香烟。

“高岗坐这儿,记住,他烟瘾最大,放一包不行,就他这里要放一筒香烟,每次一筒。一筒也不准够,抽完了要及时再上。朱老总不抽,总理不抽,陈云也不抽烟……”

李维信悄悄擦汗,老同志却猛地回过头

来说：“哎，我给你讲了没有？”

“什么讲了没有？”

“主席是吃茶叶的，如果茶叶吃掉了要赶紧换上新茶。有几位吃茶叶的首长，特别是彭老总吃得厉害，第一杯茶就吃掉，有时冲一次吃一次，你注意别叫杯子空了……”

要交待的事太多，老同志一次讲不完，李维信一次也记不全，还得跟在老同志屁股后边实践一段。

刚建国，天下大乱要转到天下大治，何况又有朝鲜战争，天天大会小会不断。

勤政殿里，勤政的中共领导们又开会了。

李维信跟着老同志实践上茶。开水刚冲进茶杯，老同志就说：“这是周总理的，上快些。总理喝茶有讲究，讲究趁着热汽往上蒸，开盖马上闻闻，喝两口，因为这时的茶香最浓，泡久香味就没有了。”

杯子放在茶碟上，李维信一手托碟一手扶杯迈开小碎步快速往上送水。太紧张，手有些抖，滚开的水晃着朝外溢，烫了手。他忍住疼，手换个位置，抓住杯子把儿。

茶水送到周总理面前，总理没接杯，微笑着点点头，示意他把杯子放桌上。

李维信放下杯子，也朝总理笑笑，转身退下，身上轻松了许多。准备继续给首长上水。

可是，老同志忽然朝他瞪眼，训斥一声：“你想烫死总理呀？”

李维信吓一大跳，这可是反革命干的事。

“你抓着杯子把，还给总理递水，你叫总理抓哪儿？那么烫，你叫总理抓杯子吗？”

于是，李维信牢牢记住并且马上养成了习惯：上水要将杯子把儿让给首长或客人，不能自己先抓住。

给高岗上水下来，李维信心神不定地朝玻璃上照照面孔，小声问老同志：“你看我怎么了？主席老盯住我看……”

老同志这次讲得轻松：“没什么，每次来了新人，主席都要盯住看几眼，再见面就认识了。”

李维信一阵激动，这么说来，毛主席已经认识他了。

老同志还在叮咛：“上几次水你就可以给主席上水了。主席不喜欢别人见了他紧张，哆哆嗦嗦洒水，主席最讨厌，主席喜欢大大方方。”

李维信牢牢记住，并且马上注意大大方方，不过这杯水是上给林伯渠的。

“哎，这不是我的杯子么。”林伯渠提意见。

李维信大方不起来了，望着杯子上的号码，脑子飞快转。糟糕，这个号码是董必武的！他一下子冒汗了，老同志怎么也搞错了，让他给林伯渠端上来，他紧张望两边，找董必武……

老同志过来了，不慌不忙说：“林老，对不起，您的杯子打了，换了这个杯子。”

“噢，我说不对呢……”林伯渠接下来杯子。

上完水时，李维信已经出透一身汗。再看勤政殿，已是烟雾腾腾失了火一般。几位吸烟的首长喷云吐雾，抽得都那么凶。

彭德怀不吸烟，喝茶比别的首长快，第一个喝完，并且伸出一根手指探入杯子一拨，茶叶便进了嘴，津津有味地嚼着。李维信马上行动，替彭总换茶上水。彭总朝着他笑，还得意地眨眨眼。

那时，中南海服务组总共只有十人，管着颐年堂、怀仁堂、含和堂、勤政殿、春藕斋、西楼大厅……人手非常紧。勤政殿里的会议，首长们谈些什么，李维信几乎没听见，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心思全用在服务上也还不够使。老同志不断地给他出些新题目：

“少奇同志的前门烟不多了，利用他讲话的机会，你上水服务，设法把咱们的中华烟弄点装到他的前门烟盒里。”

这项服务是很带刺激性和趣味性的，像小时候偷杏吃一样撩拨人心。李维信马上实践。他是怀了一颗雀跃的心“摸上去作案”，虽



然手指抖得比平日笨,气也有些不够用,但毕竟还是“作案”成功,又怀了一种莫名的喜悦退下来。

后来,他几经“作案”,成了“老手”,就把“案”做到了毛主席的头上。毛主席能抽出三五烟味道不同,看一眼牌号,一笑便过去了。他不在意这种细微小事,也不留心这类小事给服务员带来多少欢乐。

对于高岗副主席是无须“作案”的。他坐下来先不动茶杯,先抓那个中华烟筒,有时不等坐下便抓过烟筒揭盖,随即抽出一支烟,点火吸燃,每次都抽得又凶又狠,像是直接用肺往里吸。一筒中华烟五十支,他经常不够吸。因为那时的会议多数是在夜里,一开一夜,高岗的烟不会停。服务员背地里偷偷说,他是“一次火”,每次开会吸烟只划一次火柴,吸燃香烟之后便不会停,一支接一支地续燃下去,烟缸一会儿就冒了尖。会议结束后,他坐的位置最难打扫卫生,桌面上、桌下、椅子四周,到处是烟头和烟灰,又被坐久了而不停移动的双脚踩牢在地板上,踩出各种烟灰构成的画面,扫不净,必须用抹布连擦几遍。

那时不讲什么尼古丁致癌,只讲抽烟多了嗓子和气管容易发炎,几位抽烟凶的中央领导身边常离不开痰盂;不抽烟的坐久了这种烟雾腾腾的环境,气管也就跟着发炎,身边也就免不了要摆痰盂。经医生一再努力,中央领导们开始采取措施,改变会议环境和“生存条件”。

人多的会议搬到了西楼大厅,那里采光和通风条件都要好一些,空间也大些。更重要的是开展了“瓜子代烟”的运动。

这场“戒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会议桌上不摆烟了,也不摆糖果,因为吃糖不影响吸烟。首长们常常是嘴里含了糖,又叼上烟,服务组便“赔了夫人又折兵”。何况,糖进了嘴,不知是腻喉还是润喉,那烟反而越抽越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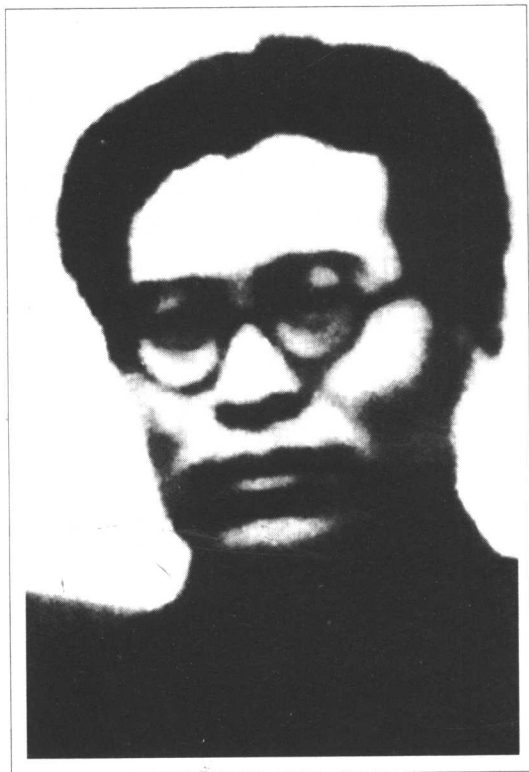
于是,决定摆瓜子。

毛主席喜欢吃黑瓜子(西瓜子),刘少奇喜欢吃葵花子,高岗是不管黑的白的,能吃的就往嘴里放。

毛主席吃瓜子是有一档没一档,不经心地嗑几颗;但是这样嗑一夜,那瓜子皮也就积不少。他是嗑一颗,将瓜子皮摆桌上一颗,摆到香烟盒那么大片时,就不再扩张面积,而是将皮在原基础朝上叠放。越往上放,越仔细,散会时,一座瓜子皮构成的“宝塔山”便“建”成了,天天夜里开会,天天夜里建一座“宝塔山”。

刘少奇吃瓜子很细心,嗑开后,有时还要看一眼里面的瓜子仁儿,怕嗑出“臭虫”来(人们常把霉变了的瓜子仁儿叫臭虫)。他也很注意卫生,不乱丢瓜子皮,认真放在桌子上,但是葵花子是炒出来的,不像西瓜子有黏性,所以建不成“塔”,只能堆成“蒙古包”,并且时不时要用手归置归置,不让瓜子皮散落开。

高岗又不同,服务员们形容他是“抽烟像



高岗

逮住鬼子汉奸,又凶又狠;吃瓜子像八路军攻城,又快又猛。”他吸烟不误吃瓜子,吃瓜子不误吸烟,手嘴一道忙碌,像进行一项什么伟大的事业一般。不过,这次“事业”进行得既轰轰烈烈,又很粗糙;烟灰随意掸向周围,瓜子皮吐得到处都是。会议进行得越紧张,气氛越热烈,他的动作也跟着越紧张,越热烈;丝丝的吸烟声和劈叭的嗑裂瓜子皮的声音给整个会议增添不少声色;一道烟柱从他嘴里喷出,射上天,冲向前,有时还左右横扫,瓜子皮更是飞舞一片,不时落在其他中央首长的身上,他自己仍毫无感觉,心思显然都在会议讨论的问题上。直到散会,周恩来或李富春惊讶一声:“噢,我身上哪来这么多瓜子皮?”他才恍然大悟:“怎么,吐你身上了?糟糕呢……”

服务员打扫卫生,最难打扫的仍然是高岗的座位,烟头烟灰和过去一样多,还增加一簸箕瓜子皮。他嗑的瓜子皮,有时一簸箕都装不下,要分两次装。这和高岗正当年富力强,心高气盛,精力充沛,身体强健又生性不拘小节有关。同时,也和体力消耗大而又没夜餐有关。

那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整夜开会。这个会刚完又开那个会,大会完了开小会,有时是个别谈话,从来不曾吃夜餐。有几次会议开了十几个小时,仍然没吃

一口饭。这就难怪年富力强的人要没完没了大嗑瓜子,“像八路军攻城”一样。

李维信在中南海服务到第五个年头,只见首长们吃过两次夜餐。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捞糟,没菜,咸菜疙瘩也没一块。另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挂面,一两半左右,没肉没菜的清水面。

唯一例外的是朱德总司令。五大书记开会,他常常是开一会儿就回去休息了。毛泽东照顾他年纪大了,不勉强他熬夜。就是白天开会,毛泽东也照顾他例外,别人开多长时间也不吃饭,只有朱德不吃不行,到钟点就一定要吃饭,再重要再紧张的会议也不能影响。颐年堂旁边有个厢房,卫士把饭用饭盒送去,朱德一到钟点便独自退席,到厢房里吃饭,并且痛快地呼吸一番,指着会议室小声嘀咕:“里边烟气太大,呛得受不了。”

瓜子吃了一年,不抽烟的还是不抽烟,吸烟的还是吸烟,并且多了一个嗑瓜子的习惯,轰轰烈烈的戒烟运动就这么夭折了。

既然戒不了烟,摆瓜子的积极性就没了。高岗不习惯桌上没瓜子,大声问:“瓜子呢?”服务员聪明地说:“首长戒烟我们就摆瓜子。”高岗怔了怔,说:“不摆拉倒,我回家再嗑。”

从此,瓜子就在会议桌上绝迹了。



中央全会上一个首长哭了

这次的会议气氛不一般。

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主席没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各省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前就全部摆上水,不像过去,人到了才现冲茶,现上水。

有关领导向服务人员宣布命令:“会议中间不许上水。”

似乎还不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又亲自对服务人员宣布:“我不说话,任何人不许进去。”

那时的人组织纪律观念强,没有人打听,更没有人议论,服务人员都规规矩矩守在会场外。

会议时间很长,一百多与会人员经不起长时间断水。快中午时,有关领导过来了,目光在服务人员身上扫过,忽然朝李维信一指:“小李,你来。”

李维信应声而起,跟领导走几步,又跟领导立住脚。

“你去上水,就你一个人。”领导略停顿一下,放低声音,因而更显出强调的语气,“进去无论听到任何事情都不许说,一个字也不许讲,这是考验你的党性呢。”

“是!”李维信庄严地回答。

他放轻脚步走入会场,会场里烟雾弥漫,可以看到周恩来正在发言,站在会场前面,口气非常严厉。李维信还是第一次见周总理这

样激烈地讲话。

他要求自己什么也不许听,可是做不到。他还是听到了,是在批判高岗、饶漱石。

李维信轻手轻脚地出入于会场,轻手轻脚地给中央领导及与会者们上水。他大致听明白,高岗和饶漱石出事了,不行了。

他注意到,高岗没有参加会。他那时暗暗震惊。

他跟高岗打交道不少,高岗身材高大,彭老总喜欢说他“高大麻子”,其实他肤色很白,不是人们容易想像的那种满脸黑麻坑,而是浅白麻子,离远点是看不出来的。他梳着挺精神的大背头,浓眉毛,高鼻梁,眼睛不大却目光灼灼,戴一副近视镜,喜欢从镜框上面闪出两道锐利的目光打量人,他那一身粗大骨骼再配上颇显粗犷高大的陕北腔,讲起话来,颇有点威风。

在颐年堂和勤政殿里的高级会议上,李维信看惯了他不拘小节的大幅度动作,听惯了他高亢的陕北腔,他是个感情外露,很富特色的大人物。没想到他滑到了反党,阴谋篡夺党和政府权力的死路上。这次会议以后,李维信再没见到高岗。后来他才知道,高岗自杀了。

上完水,李维信一脸严肃地回到服务人员中间,什么也没讲,也没一个人向他打问。从此,他听到的话就埋进肚子里,直到几十年



后的今天,他也没对任何人讲。

这是一种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他在中南海工作五年,家里的亲人还没一个知道他去了哪儿。亲生父母都不知道。

大会之后,在西楼会议室开小组会。

华东组由陈毅主持,饶漱石参加了。

再严密的会,水还是要喝。分组讨论会,不可能只由一名服务员上水。各组都得有人上水。

给华东组上水的小服务员是新来的,科长交待说:“无论听见什么都不许说一个字,就烂肚子里。有事多汇报。”

服务员接受命令,谨慎小心地进去上水。

出来时,他有些紧张。他不认识饶漱石,

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大事,在他心目中,党支部书记都很叫人神秘,叫人尊敬,何况中央的领导干部?

他紧张不解地赶紧向科长汇报:“科长,不知怎么了,我看见一个首长哭了。”

科长猛地瞪起眼,凶凶地:“再说?”

“一、一个首长哭了……”

“还说!再说看我揍你!”

服务员一下子捂住嘴,不知是怕嘴巴又说出什么,还是怕科长真揍他一巴掌。

“烂肚子里,懂吧?”

服务员手抓着嘴巴,眼皮掀着望科长,一边颤抖一边点头。整个会议期间,就走漏这么一条消息:“我看见一个首长哭了。”



邓小平、陈毅和饶漱石(前排左一)等人在西柏坡